《明日之城》读书报告

衰退、贫困与犯罪的再关注

维多利亚时代的梦魇其实从未离开。不仅如此，它的变种在新大陆找到了新的宿主。

时钟来到80年代。芒福德将童年的纽约和80年代的纽约相比，沮丧于暴力与违法的蔓延：暴力似乎已从一个局部的疔疮蔓延到整个城市的血液中。不管衰退、贫困与犯罪多么令人不适，难以正视，但其确实作为布料嵌入了城市的肌理中——但和维多利亚时代不同，如今更新增棘手的种族因素。若要追溯历史，美国的大城市的inner city 和ghetto问题，其实与奴隶解放史、移民史密不可分，在空间中表现为一种待处理的历史性积压，如埋下的雷管。随时待爆发。

其实在大西洋彼岸的撒切尔英国，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坎伯特雷大主教任命的一个小组发布报告《Faith in the city》，其中注意到令人不安的、普鲁伊特-伊戈（Pruitt-Igoe）式的、物质性崩坏和社会性解体竞相疯长的双头怪胎。报告其实很像自杜波伊斯、弗莱泽一脉相承的“芝加哥范式”：家庭解体、底层家庭母系化、教育崩坏、旷课逃学、犯罪青少年化、福利依赖、吸毒酗酒泛滥、巨大的落差感、独特的宿命主义情绪等，这些都是美国社会学家研究黑人底层社会时常触及的命题，遵循着纯粹的Pruitt-Igoe式逻辑：“无就业-贫困-白人与中产黑人逃离-暴力犯罪-社会解体”的恶性循环。启迪性的是，这次报告将矛头直指撒切尔政府的政策和其政策背后的态度：穷人承担了衰退的负担，也正是这些穷人被视为依赖福利者、对社区和社会安全的威胁者、阻碍经济恢复的国家的沉重负担——熟悉而赤裸的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味道。

除了类似撒切尔政府式的政治转向，更加剧问题的是信息时代的来临、投机性金融业的兴起，和制造业不可避免的衰退——这三者是共生的：信息产业使制造业分散成为可能，于是只要成本够低，制造业就能跨越文化和语言的国界，而这一切只需要密集性、中心性的金融决策就够了。在这次经济重心的转向中，费城、底特律是失败者，伦敦、纽约则是得利者——得利者选择将种族和暴力犯罪围上藩篱，失败者则进一步落入深渊。于是衰退-贫困-犯罪的循环以及种族问题遗留，就带动着齿轮不断旋转。

建筑规划师黄金年代的逝去

总体而言，二十世纪的80年代前的部分就是建筑规划师的黄金时代。

言其为黄金年代并不是说其实践有多么美妙：柯布西耶臭名昭著的普鲁伊特-伊戈（Pruitt-Igoe）就是一例，“建筑作为居住的机器”多么美妙，但在现实中不考虑社会维度的冰冷居住机械，对恶性循环束手无策；城市更新计划在无数的罗伯特·莫斯式的建筑规划师的牵线推动下确乎如其名“联邦推土机”，铲平了内城和贫民窟，新建的基础设施一扫原有阴霾，使其间的黑人和移民无家可归，无怪乎詹姆斯·鲍德温言Urban Renewal实为Negro Removal。GI法案创造出无数Levittown，流水线式生产打包出来的、white picket fence包围的一妻两孩、有车有房的中产郊区美国梦，不管被愤世嫉俗的老头米兰·昆德拉如何斥之为Kitsch（刻奇，也译为媚俗）式的美化的虚假幻象，普通人如你我也不得不承认其确实既悦耳动听又令人心动——尽管其存在着令人咂舌的对土地、资源的挥霍浪费、对生态的破坏、对汽车交通的绝对依赖、肿瘤式的无限蔓延（更不必言GI 法案对黑人老兵不加掩饰的种族排斥）。

但是确实是黄金时代。面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哀嚎，建筑规划师们有着不同的解决方案：田园之城、区域之城、塔楼之城、公路之城、纪念之城——不管理论能不能映入现实、不管映入现实时有没有异化。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在被频繁引用的同时也被频繁异化，就如radburn邻里单元设计被当做理想的美式安全富庶的沥青郊区的蓝本；激进的现代主义大师如柯布西耶和赖特走上集中的“太阳城”和分散的“广亩城”的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实践中阿伯克龙比和大伦敦规划、沙里宁和大赫尔辛基有机疏散如平行的铁轨在不同时空展开，还有格迪斯和芒福德这一对关系复杂的老友。黄金时代的建筑规划师（最佳典范就如莫斯，即使他因de-slumming饱受争议），不管如何，也许没有忘记维多利亚的哀嚎，在规划师还被赋予较大程度上的自由与权力的时代，他们在脑海中不受拘束地经天纬地，在实践中，乘着战后城市复兴和福利国家的余波，于掌握政治角力这门艺术后，把汇聚整合后的共识（即使是精英式的共识）为蓝图烙在城市的土地上。但那规划师的黄金年代很快就逝去了，而它并不是毁灭在简·雅各布斯们手上。

哈耶克伪政治-经济哲学的复兴和新自由主义秩序

且不评判哈耶克本身理论的正确与否，以复兴的（也许是异化的）哈耶克-米塞斯哲学为大旗的其无数忠实拥趸，在理论上充斥着诸多谬误和漏洞，在实践上为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秩序铺路。哈耶克的拥趸反对政府管控下的计划经济，认为若抛弃个人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将导致自由丧失、独裁暴政、社会压迫和个人奴役，认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英国福利式的和美国FDR新政式的）是和共产主义、纳粹主义相提并论的洪水猛兽，认为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灵药。

在新自由主义逻辑下，不平等被称作德性，财富生产者将涓滴惠及每个人；竞争是人类关系的本质，限制竞争对自由不利；税收和法规会限制进步，公共服务如医疗住房应被私有化（寡头化）；结构性失业是因为缺乏进取心，付不起住房和医疗不怪寡头。新自由主义提倡自由竞争，实际却为寡头利益张本；但是寡头Too big to fail，没法倒闭（必要设施的倒闭就意味着社会的功能停摆和瘫痪）；于是利润归寡头、风险归国家，于是十年轮回一次、纳税人钱救市；于是哈耶克伪政治-经济哲学（称其伪faux是因为谬误百出）就这样形塑了当代的世界秩序、乃至千禧一代、Gen Z世界观，变得根深蒂固。

哈耶克学说本身并无什么高明之处，但却因为在正确的时间（7、80年代的经济衰退），遇到了正确的人（撒切尔和里根都是其忠实拥趸），而成为主流追捧的典范，无疑完成了对FDR新政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向。令人玩味的是，正如书中《理论之城》提及的，在70年代的学术圈（包括规划学术圈）出现了马克思研究集中式、爆发式的复兴，但其无疑是限制性和排他性极强的“小楼成一统”的象牙塔学术，阻挡不了实践中80年代政治-经济图景中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开闸防洪与普遍泛滥；它更促成了学术与实践的分离。当然，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社会民主主义”一词已经被污名化，3、40年代萧条时期的FDR新政为了被当代新自由主义的主流价值纳入框架而被“美化”（去洪水猛兽化），不少人不承认其为社会民主主义，但这里姑且称之。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

现代意义上国家和政府对其城市的规划，或者说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学科的起源，始于19世纪末期中上层阶级对他们发现的维多利亚时代城市的贫民窟城市的恐怖惨状的反应。但回顾这世纪的历程，问题变成了：城市规划真的能胜任社会问题吗？物质性的建筑师和规划者真的能够重塑更隐蔽、抽象的社会深层次结构吗（哪怕仅是分毫）？对此并无一刀切的答案——但想要回答此，我们恐怕得问得更深：规划的原初传统是否还存在？如果不在，我们将往哪里去？

现代城市规划必然将会继续存活：在安格鲁-萨克逊式的发达国家，随着其城市中（从长远看来是）不断增长与聚集的“共同体”的财富的累积，在个人能力触碰到对邻里环境的美化改造可行性边界的穹顶后，无论出于土地保值的需要还是生活品质的诉求，必然走向公共政治的领域——即使以内城空心化再绅士化、以及无止境的郊区化蔓延为代价；在特权阶级和石油、原材料开采经济统治的第三世界，作为纪念性的城市规划建筑，偶尔也会在利雅得和巴布这样的城市异地移植嫁接，不管作为国家荣光的彰显还是资本奇观的炫耀，显现纪念性传统长久的生命力与历史的重复性。

但是城市规划的原初传统——那种发源于解决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贫民窟的迫切性期许的传统，其消亡与“复活”则取决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图景。其中最简单而明显的例子，就是二战后广泛的英国和美国公共住房计划实质性“消亡”的命运——在之前就公共住房计划政治上直接地在英国被撒切尔终止、在美国则是里根（撒切尔实行Right-to-Buy法，但不许地方政府用卖公共住房的钱建新房，实际造成了公共住房的缩减和供不应求，在《明日之城》中也提及撒切尔意图彻底瓦解战略规划体系、取消行政辖区规划；里根上台第一年就将Section 8公共住房补贴经费削减一半至约$17.5 billion，其它不必赘述）。这和7、80年代前后石油危机和全面衰退、哈耶克的思潮复兴、政治-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有关，但同时不免让人怀疑——是否一旦经济衰退到来，原初热情就将退场？或者新自由主义的根深蒂固是否意味着这不是历史螺旋前进的权宜，而是永恒的消亡？规划的黄金时代、乃至其原初传统还有“复活”的一天吗？

当然，悲观者、激进者会进一步说，如果将城市规划简单理解为其诞生于对另一种替代社会的构想，那么其已然而且必然消亡，未消亡也已从实践中退场，“脱离于混凝土而龟缩于象牙塔”，排他性的学术圈越与左翼激进马克思主义合谋，越愈发脱离右翼的里根-撒切尔资本现实，成为理论之城。其必然性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从芒福德式的悲观视角看，美国早已被打包出售给了大公司，在资本无处不在的铁笼之下，规划很难不“沿着资本阻力最小（也即利润最大）的方向”前进，即使规划师自己拥有崇高的理想主义光辉而不情愿。在80年代后的萧条与紧缩时期的降临（也即建筑规划师黄金时代的终结时），现代政治-经济体制确乎抛弃了40年代FDR的社会民主主义方针，转向了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教义，彻底演变成市场之城、企业之城。

而其后果，就是“城市美化运动”的复兴——但这次有所不同，如果说城市美化还将掩盖隐藏中下阶级作为动机，如今公众和媒体对繁华富庶的高档住宅区、雅痞化（yuppie）的商业中心和破败萧条、犯罪弥漫的贫民窟比邻而居也毫不在意——只是漠不关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诞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带有迫切性改变的热望的规划，在如今其炭火已凉，皮生老茧——即使相比维多利亚时代，安格鲁-萨克逊国家财富几何式的增长使得其完全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新自由主义面对以其逻辑的齿轮规划的城市中最根本的痼疾——贫困及其衍生的社会解体和犯罪冲突，始终隔靴搔痒或视而不见——或许因为其意识到自己就是始作俑者，是其溃疡上开出的花朵，任何修复的尝试都是对自己合法性的祓除。

于是我们从哪里来，又回到了哪里去。于是在一种时空推拉的错乱感中，又回到了前维多利亚时代，大城市对其底层的论调止于新自由主义式的睥睨：对道德败坏和不努力工作的批判，城市的下层阶级重新被排除于主流视野之外——道德占高地还同时不碍观瞻。于是，“改变的共识”被漠然的铁笼取代——也许这就是城市对待其永恒底层的常态，那种狭义的规划传统在英美的诞生与消亡其实是短暂的朝生暮死，是结构性乌云对底层偶尔的慈悲开恩降下甘霖——当然，这是悲观者。乐观者则可以永远无限乐观，漠不关心者则认为根本没必要这么大篇幅讨论底层：大城市永远会存在底层——不管是原有的，还是如磁铁般被吸引过来的——只是数量问题。

前面被回避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下的城市规划将来往哪里去？出于谨慎，很难说。也许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传统会使其更接近原初，也许漫长过程后也会经历萧条，为类似新自由主义的教条让步，嬗变得面目难辨。当然，que sera sera，我们的城市已经比维多利亚时代进步了许多，而至于将来往哪里去，等待即可，不必道德义愤，也不必犬儒悲观——一切都在其自有的、内生的铁笼和齿轮的掌控之下，不管是什么主义的铁笼和齿轮。